

# 论“归化”与“domestication”、 “异化”与“foreignization”

吴蓉 610225 四川成都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近十几年来,归化与异化一直是国内外译学界的热门话题。而其中又数瓦奴蒂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但国内翻译界不少人对归化及异化的理解并不完全等同于瓦奴蒂的定义。瓦奴蒂所指的并非仅仅是语言文化层次上的归化与异化,他的探讨已拓展到翻译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所谓异化也并不意味着比归化更忠实于原文,而指通过异化的翻译手段引入抵抗目的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文化、思想因素。

**关键词:**归化;异化;瓦奴蒂

最近十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瓦奴蒂(Lawrence Venuti, 1953 - )于1995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在国内主要的翻译期刊上,论述归化与异化的专题论文不少,而在论述其他翻译问题时涉及的则更多。”<sup>[1]</sup>比如,关于近两年国内翻译界最热门的话题——译者主体性的文章大多都会谈到归化与异化,因为这个话题就来源于对异化的探讨。<sup>[2]</sup>

以前国内翻译界曾采用“adaptation”“assimilation”“familiarization”“alienation”“ostranenie”及“defamiliarization”等词来翻译归化与异化这对术语,而自从瓦奴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提出了

---

收稿日期:2009-07-03

作者简介:吴蓉(1980-),女,四川成都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domestication” / “foreignization”这对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的术语后，国内翻译界就普遍将“domestication”与“foreignization”作为归化与异化的英译，也将它们视为归化与异化的对等概念。但是笔者仔细分析后发现，尽管目前国内翻译界已普遍视“domestication”与“foreignization”为归化与异化的对等英译，国内翻译界对归化与异化及其英译“domestication”与“foreignization”的理解却与瓦奴蒂赋予“domestication”与“foreignization”的含义不尽相同。

## 一、国内翻译界对“归化”及“异化”的理解

归化与异化大讨论的发起者刘英凯在其《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中对“归化”的解释是“入籍”。他认为翻译中的“归化”指的是“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余则类推”。此外，他“根据中国译坛现实，将归化的表现形式归纳为五种类型：1. 滥用四字格成语；2. 滥用古雅词语；3. 滥用‘抽象法’；4. 滥用‘替代法’；5. 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sup>[3]</sup>。《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化”一词的定义则是：

1. 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2. 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3. 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sup>[4]</sup>

由此可见，汉语中的归化和异化主要指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国内翻译界主要探讨的也的确是从一种语言文化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中语言文化因素所经历的各种变化。<sup>[5]</sup>

为了更加清楚地证明上述观点，笔者随意从几篇谈到归化与异化的文章中选取了几个例子：

1. She fixed her eyes wistfully on the tower of the palace, which rose out of the lower darkness like a pillar of roughened gold.<sup>[6]</sup>

译文一：

她的目光，沉思，又含着渴求，注视着广场上的殿堂的塔身。塔身像一根凹凸不平的金柱，从黑暗的低处突兀而起。<sup>[7]</sup>

译文二:

她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座王宫的塔楼,它像一根毛糙的金色柱子,从下面的黑暗中升起。<sup>[8]</sup>

2. They dare say no to the superpower.

译文一:

他们敢于反对那个超级大国。

译文二:

他们敢于对那个超级大国说“不”。<sup>[9]</sup>

3. A gush of tears at her mother's farewell kiss...<sup>[10]</sup>

译文一:

母亲和她吻别,使她涌出一阵热泪……<sup>[11]</sup>

译文二:

与母亲吻别时,一股热泪夺眶而出。<sup>[12]</sup>

4. To cross/pass the Rubicon: “破釜沉舟” vs. “越过卢比孔河”<sup>[13]</sup>

5.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vs.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sup>[14]</sup>

6. Many Canadians have never read a newspaper though some newspapers are free,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their ABC: “尽管有的报纸免费,许多加拿大人从不看报,因为他们不懂自己的ABC。” vs. “尽管有的报纸免费供应,许多加拿大人从不看报,因为他们目不识丁。”<sup>[15]</sup>

7. 至于才子佳人等书……: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 vs. “And the ‘boudoir romances’ ...”<sup>[16]</sup>

很显然,上述例子讨论的归化与异化实际上都属于解决语言文化层次上的归化与异化问题的翻译技巧,而这些文章中对归化与异化两词的英译也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也就是说,这些作者所理解的归化与异化就是翻译过程中解决语言文化差异的两种翻译技巧。

综上所述,国内翻译界是在语言文化层次上理解归化与异化,将它们作为解决源文本的语言文化因素的两种翻译技巧,与传统的直译/意译渊源颇深。正如林克难所言“中国翻译界……充耳不闻的几乎都是归化异化。老实不客气地说,在不少学者口中念念有词地叨叨归化异化的时候,实际心里想的还是直译意译,举出的例证也都是直译意译”<sup>[17]</sup>。

## 二、瓦奴蒂对“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的定义

“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是瓦奴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提出的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做的演讲《论翻译的方法》。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sup>[18]</sup>。瓦奴蒂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

《翻译研究词典》认为，“domestication”指“采用透明通顺的翻译策略以最小化异语文本对目的语读者的陌生感”<sup>[19]</sup>；而“foreignization”指“通过在目的文本中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性，有意打破目的系统的习惯”<sup>[20]</sup>。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瓦奴蒂指出“domesticating method”指“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对异语文本的我族中心主义式的归化的翻译方法”<sup>[21]</sup>；而“a foreignizing method”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施加一种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以显露异语文本的区别”<sup>[22]</sup>。由此可见，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中国翻译界对归化与异化的理解似乎与瓦奴蒂的定义差不多，但瓦奴蒂赋予“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的含义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瓦奴蒂的理论是建立在“翻译的暴力行为”<sup>[23]</sup>这一概念上的，他意在批评在英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归化翻译（dominant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及流畅的翻译策略（fluent tendency）并提倡异化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他认为，“翻译拥有塑造外国民族身份的巨大力量。因此它具有为种族歧视、地缘政治对抗、殖民主义、恐怖主义、战争服务的潜力……翻译可以称作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建构或批评为异国文化打上了意识形态的身份”<sup>[24]</sup>。而在谈到其理论渊源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时，瓦奴蒂指出“施莱尔马赫关于异化翻译的民族主义理论旨在挑战法国的霸权”<sup>[25]</sup>。此外，瓦奴蒂明确地宣称：“异化翻译可以压制翻译中我族中心主义暴力。这是……一种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预，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异化翻译能成为一种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有利于形成民主的地缘政

治关系。”<sup>[26]</sup>

很显然，作为一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概念，瓦奴蒂的“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关注的不仅仅是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问题，还更注重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乃至政治因素——比如殖民主义、恐怖主义、战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它是一种抵抗我族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文化自恋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方法。正如王东风所言，归化和异化“将英译层次的讨论延续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的得失问题”<sup>[27]</sup>；祝朝伟也曾撰文指出“国内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多没有跳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固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而国际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研究已不再停留在语言的内部……而是拓展到翻译的外部，如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大文化”<sup>[28]</sup>。

其次，瓦奴蒂认为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包含了两个基本任务，即“选择什么异语文本来翻译及采用什么翻译方法来翻译。这两个任务都决定于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因素”<sup>[29]</sup>。这一点是瓦奴蒂反复强调却常常被忽略的。为了更加清晰明了地阐释这个问题，也由于瓦奴蒂主要阐述的就是“foreignization”，本文将集中分析“foreignization”<sup>[30]</sup>。

瓦奴蒂认为，异化的翻译实践有两种形式：

1. 采用偏离国内盛行的话语的异化策略（比如在译文中使用大量的古语以反抗流畅透明的翻译）；<sup>[31]</sup>

2. 挑选挑战目的语中当代外国文学的典律的文本来翻译。<sup>[32]</sup>

也就是说，异化翻译不仅指采用异于盛行的，即占统治地位的归化话语的目的语来翻译，还指特意选择翻译那些异于甚至挑战目的语文化系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典律的异语文本。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关注的大都仅仅是异化翻译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他们注重的只是语言文化这些较表面的层次。

实际上，按照瓦奴蒂的观点，异化实际上共有3个层次：

第一，语言层次上的异化。国内翻译界许多对归化与异化的探讨实际上关注的都是语言层次上的异化。比如上文所列的第1、2、3例，讨论的都是译文是否在语言句序上忠于原文，是否违背了目的语语言句法的常规。

第二，文化层次上的异化。随着国内外对文化转向的热烈讨论及各种文

化研究的飞速发展，国内翻译界许多对归化与异化的探讨也都非常关注文化层次上的异化。比如上文所列的第4、5、6、7例，关注的都是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转化问题。

第三，思想层次上的异化。语言层次和文化层次上的异化实际上都是瓦奴蒂所列举的异化的翻译实践的第一种形式，即采用异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归化话语的目的语。而思想层次上的异化则关注一些层次更深的东西，比如源文本的主旨。而实现思想层次上的异化则主要采用瓦奴蒂所列举的异化翻译实践的第二种形式，即特意选择翻译那些挑战目的语系统对异语文本的当代文学典律的文本。比如，在西方当代文学典律中，东方的形象是阴性的，带有贬义的，而实现思想层次上的异化则指特意选择翻译那些体现东方真正面貌的、非阴性的、不带贬义的甚至带褒义的源文本，从而挑战乃至颠覆西方当代文学中关于东方形象的典律，达到揭露翻译实践中恶意归化源文本蒙蔽读者的文化帝国主义事实，体现翻译的政治。很可惜，就笔者所知，国内翻译界很多人完全忽略了瓦奴蒂的这一观点。这可能与瓦奴蒂在论文专著中更多专注于讨论语言层次有关，<sup>[33]</sup>但瓦奴蒂从来没有忽略对文本选择这一点的强调。

此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异化翻译的第一种形式指的是采用异于盛行的归化话语的目的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化翻译要比归化翻译更忠实于源文”<sup>[34]</sup>，而且瓦奴蒂所提倡的是采用异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归化话语的目的语来翻译。实际上，采用第一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仅仅是为了抵抗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归化的语言文化因素。这正是为什么瓦奴蒂会选择纽曼（Newman）的翻译实践来阐述其提倡异化的观点的原因。因为纽曼在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古语而不是当时盛行的用语来翻译，从而反抗流畅透明的翻译，但他的译文也并不比那些采用归化法及当时盛行的用语的译文更忠实于源文。在此，瓦奴蒂关注的不仅包括是否采用了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还包括采用的是历史化的目的语还是当前的目的语。由此可见，国内翻译界所理解的异化只是瓦奴蒂的异化思想的一部分<sup>[35]</sup>，而并非其全部含义，严复的翻译实践就是一个例证。

严复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转折期。他是那段时期最典型、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认为是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比如，王东风曾指出：“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翻译家都是靠‘削鼻剜眼’这样的归化翻译出的名，如严复、林纾、傅东华等等。”<sup>[36]</sup>严

复最出名，但对他批评最多的就是他使用了古雅的桐城派的文笔来从事翻译。实际上，尽管他的译文在语言乃至文化层次上的确十分归化，他却引进了在当时非常震撼人心的新思想、新观点，从而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加速了现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因此，按照瓦奴蒂的观点，他的译文在思想层次上是异化的翻译，是他极力提倡也十分推崇的异化的翻译，而不应统统简单称作归化的翻译。

提出思想层次上的异化这一观点正是瓦奴蒂的真正贡献，是其理论的关键之所在。因为瓦奴蒂念念不忘的要大加鞭撻的正是英美社会通过占统治地位的归化翻译、流畅的翻译策略、大量的对外翻译输出甚少输入以及对少量的输入的源文进行严格的挑选以维护在英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典律的翻译实践。在其《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瓦奴蒂曾以现代日本小说英译为例阐述这一观点。他指出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许多日本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都是“精心挑选过的，集中在为数相当少的几个作家身上”，并因此确立、维护、巩固日本小说的英译典律，使美国乃至整个欧洲读者<sup>[37]</sup>都认为典型的日本特色的东西就是“难以捉摸，迷雾一般，不确定”<sup>[38]</sup>。

### 三、结语

综上所述，瓦奴蒂赋予“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的含义不同于国内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理解。瓦奴蒂的“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层次和文化层次的问题，还包括思想层次的问题，而国内翻译界所说的归化与异化则只着眼于语言文化层次的问题，属于翻译技巧问题，二者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实际上，瓦奴蒂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英美社会的研究之上的，属于一种后殖民主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历史等对翻译的操控。他提出“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是为了提倡抵抗在西方翻译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流畅式翻译的倾向，提倡反抗长期以来在英美社会以向外输出为主却极少向内输入的翻译实践，提倡抵抗遵守目的语文化系统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并恶意归化源文使其迎合本土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从而蒙蔽本土读者的归化式翻译。这一观点是瓦奴蒂反复强调的，他所关注的也并非采用哪种翻译能使译文更加忠实于源文或翻译中如何达到对等这类这一国内翻译界非常关注的问

题。正如林克难所言“归化异化不是翻译技巧研究，尽管它也涉及人们如何翻译，但是翻译技巧是归化异化学者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他们研究的最终归宿或目的……不是应该这样翻译还是应该那样翻译”<sup>[39]</sup>。因此，笔者建议在将归化/异化作为翻译技巧来讨论时可以采用别的术语来代替“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比如“naturalization”/“exotization”或“familiarization”/“defamiliarization”或“assimilation”/“alienation”，这样就可以避免混淆这一对术语的含义。

注释：

- [1]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角——对国内归化/异化者的一个提醒》，《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第32页。
- [2] 原因在于，“异化的哲学基础就是人的主体性”。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4.
- [3] 转引自：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第25页。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1372页。
- [5] 这里所说的文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与社会阶级、经济关系密切的“文化”，而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带有政治意味的“文化”；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这个“文化”指“某群体或民族的风俗、人文现象、社会惯例等”。（参见：A. S. Hornby,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p. 347.）本文所提及的“文化”指的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
- [6]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49页。
- [7]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49-50页。
- [8]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50页。
- [9]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50页。
- [10]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50页。
- [11] 转引自：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



50 页。

- [12] 转引自: 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国翻译》2003 年第 1 期,第 50 页。
- [13] 谭惠娟,《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中国翻译》1999 年第 1 期,第 32 页。
- [14] 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中国翻译》2002 年第 5 期,第 37 页。
- [15] 孟建钢,《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中国翻译》2002 年第 5 期,第 30 页。
- [16] 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中国翻译》2002 年第 6 期,第 23 页。
- [17] 林克难,《翻译研究期待百花齐放》,《上海翻译》2005 年第 1 期,第 3 页。
- [18] 转引自: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9 - 20.
- [19] S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 43 - 44.
- [20] S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59.
- [21]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81.
- [22]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81.
- [23]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9.
- [24]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9.
- [25]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09.
- [26]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0.
- [27] 王东风,《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 年第 5 期,第 25 页。
- [28] 祝朝伟,《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91 页。
- [29] Lawrence Venuti,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240.

- [30] 鉴于“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是成对的两个概念，故只要能弄清“foreignization”的含义，也就能弄清“domestication”的含义。
- [31]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48.
- [32]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48.
- [33] 这可能源于瓦奴蒂深受德国翻译传统的影响。在德国翻译传统中，异化翻译就强调语言层次（参见：Lawrence Venuti,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242）。而且，他所专注讨论的语言层次也不同于上述例证中的讨论，他更关注的是用古语等异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来翻译源文本，以体现源文本的时代性和异域性。
- [34]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91.
- [35] 在瓦奴蒂的理论体系中，“domestication”作为与“foreignization”成对的概念，其含义当然也包括了上述两种形式三个层次。
- [36] 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第15页。
- [37] 当时，英译日本小说一般都转译成了欧洲其他语言。
- [38] 劳伦斯·瓦奴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65-366页。
- [39] 林克难，《翻译研究期待百花齐放》，《上海翻译》2005年第1期，第3页。